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第四辑

yanbiandaxueyazhouyanjiuzhongxinxueshucongshu

朝鲜—韩国文学 与东亚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第四辑

yanbiandaxueyazhouyanjiuzhongxin xueshucongshu

朝鲜—韩国文学 与东亚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韩国文学与东亚/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4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第四辑)

ISBN 978-7-5634-2756-7

I. 朝… II. 延… III. 亚洲—研究—丛书 IV. K300.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0521 号

朝鲜—韩国文学与东亚

编: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朴莲顺

封面设计:金胜铉

出版发行:延边大学出版社

社址: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133002

网址: <http://www.ydcbs.com>

E-mail: ydcbs@ydcbs.com

电话:0433-2732435

传真:0433-2732434

发行部电话:0433-2133001

传真:0433-2733266

印刷: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5.875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000 册

版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

ISBN 978-7-5634-2756-7

定价:35.00 元

总 序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地区社会的稳定等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亚洲尤其是朝鲜半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该地区,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这需要我们从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方面入手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如何使朝鲜半岛在亚洲振兴的历程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亚洲和全球学界业界人士共同面临的课题。为此,2006 年 12 月,中国延边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创建了以“朝鲜—韩国学”研究为主题的亚洲研究中心。

本中心是以朝鲜—韩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文化以及跨学科的中韩(朝)日文化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心的国际性学术研究机构。本中心立足以延边大学的地缘政治、文化历史的学术积累为依托,在展示和发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同时,借鉴并吸收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并逐步发展成为在此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较高水平的学术论坛。

本中心以“亚洲地区社会和谐发展与朝鲜—韩国文化”为主题,推动亚洲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当今经济全球化给亚洲地区带来的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所面

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多维和深入的学术研讨,并为该地区的和谐发展与和平稳定提供政策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本中心每年定期举办“图们江论坛”,出版《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丛书》,资助中国延边大学优秀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资助中国延边大学各层次教学科研人员的学术研究,评选朝鲜—韩国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学术成果奖——卧龙学术奖。此外,中心还不定期举办各类研讨会和学术讲座。

2007年,我们选定四项科研课题为本年度的出版资助项目,目的是鼓励我校教学科研人员在朝鲜—韩国学以及亚洲研究领域进行学术创新、多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以提高我校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今天面世的这套丛书,其目的在于以文聚友,通过交流和研究,开阔视野,积累经验,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此引领朝鲜—韩国学以及整个亚洲的学术研究。

在各界朋友的关心、帮助和促动下,在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该丛书一定能够被打造成高品位的学术精品,以此为促进韩国学以及亚洲的学术发展尽力。

《延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丛书》编委会

序 言

这部编著是依据在延边大学举办的“2007 年朝鲜—韩国文学与东亚国际学术会议”的 20 多篇论文编辑而成。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朝鲜—韩国文学与东亚”。由这个主题,我不禁联想到中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针对东方文学复兴趋势而感发的一句话,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引领近代人类文明的西方文明,在 19 世纪末开始就已凸现出其局限性。譬如,作为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征服与开发”,破坏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导致了今天的战争、冲突与环境污染等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证明了仅仅依照西方的价值观,再也难以维系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对策,就是去“发现东方”,即重新去发掘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被西方文化遮蔽光芒的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国家的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并由此克服西方文化的局限性。譬如,“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和合共生,可以去充分克服西方文化的局限性。

一言以蔽之,今后人类文明的发展再也不能持有一元化的价值观,而是要遵循“多元共存”的原则,持有多元化的价值观。即,力主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合,并以此作为

人类共同的财富与成长的动力。

作为重要的文化“器皿”的文学,也与此相同,必须以东亚的视角,重新阐释、阐释以西方人的视角加以概念化、范畴化、体系化的东亚文学,与此同时,要充分阐明中国文学、韩国文学、日本文学等东亚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价值。

韩国文学尽管在古代受到中国文学的巨大影响,在近代又大量汲取日本文学、西方文学的营养,但在文学思想、文学理论乃至一些作家作品方面,仍保持着自身的传统与特殊性、优越性。对此,在“东亚”的语境中,我们应该通过交流与比较加以阐明。编撰此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最后,我谨向资助此书出版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表示衷心的感谢。

金柄珉(中国延边大学校长、教授)

目 录

总序	(1)
序言	(1)

总论:

《玉楼梦》儒佛道思想剖析/韦旭升	(1)
东亚的融合与韩国文学的本体性/全寅初	(27)
东亚韩国学研究方法之探索/蔡美花	(42)

古代文学研究:

东亚文明进程黎明期的文化研究/严绍璿	(54)
高丽中期汉诗中的道教思想探析/李钟殷	(88)
熊图腾与东北亚满一通古斯诸民族民间文学/金宽雄	(97)
词集、词谱的传入与高丽、韩国文人对词体的接受/李承梅	(127)
18 世纪的读书文化与实学派的读书论/金泳	(148)
韩国诗人金时习诗歌中的老庄哲学思想/吴绍钊	(163)
古典小说《九云梦》中所体现的儒、佛思想的和谐/薛盛璟	(181)
论时调创作上的两点问题/金海龙	(193)
18、19 世纪的北京琉璃厂与朝鲜文人/郑珉	(205)

《皇帝》:病贵妃、钟馗骑马与明皇镜/张哲俊	(212)
圃隐郑梦周的南京使行与诗歌创作研究/俞成云	(229)
《燕途纪行》中的顺治形象/刘广铭	(251)
李德懋诗学观与王士禛诗学观之比较/徐东日	(277)
试论荪谷李达的学唐/韩继镐	(292)
“燕行录”中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形象研究:意义与价值 /金英今	(302)

现当代文学研究:

解放前中国流移民文学的坐标/表彦福	(314)
对近代文明的反省与抒情的形象化/金虎雄	(326)
数字时代的文学、艺术/尹汝卓	(351)
诗歌类似性探究方案研究/金炳善	(371)
解放后朝鲜族小说叙事方式探析/李光一	(401)
试论韩国的少年战争体验小说/牛林杰	(422)
由身份认同的不同而引起的文学表现之不同/张春植	(437)
流移民的生活空间及其情绪/金京勋	(460)
2000年以后韩国小说的影像/安南日	(487)

《玉楼梦》儒佛道思想剖析

韦旭升(中国北京大学)

《玉楼梦》是韩国古典文学中的一大瑰宝,它以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成熟多彩的艺术手法,灿烂地展示在读者眼前。对于《玉楼梦》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其中有一部分论述了它蕴含的儒、佛、道思想。这里,笔者对这部作品中的这三种思想作进一步的剖析,进而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部作品在这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特色。

一、儒家思想对《玉楼梦》的影响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经过孟轲等儒学者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代,取得了统治地位。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提出的“独尊儒术”得到了王朝的采纳和推行,儒学成为支配整个封建王朝政治社会乃至家庭的思想规范。

这种思想规范的核心,我们可以最早从《论语·颜渊》所载的“齐景公问孔子关于为政之道”的谈话中初见端倪。孔子也有这样一段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

就是把孔子的这种思想加以扩展、深化、系统化而成的。而宋朝的理学大家朱熹(1130—1200)在为《论语》作注时则进一步将“三纲五常”解释为“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论语·为政》注),并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天理”。这一规范的基本内容,概括了儒家对政治统治、人伦道德、家庭模式的基本要求和是非善恶的标准,长期以来,是维系和巩固封建社会秩序、保持国家统治与社会运行的一大纽带。

韩国早已接受了儒家学说,朝鲜王朝后半期,理学更是盛行,朱熹备受推崇,被尊之为“朱子”,“朱子学”大受重视。儒家的这种“三纲五常”规范被视为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玉楼梦》的作者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三纲”

《玉楼梦》中的儒家思想,其核心,就是这个“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玉楼梦》这部作品从人物刻画、情节转换乃至事件发展,无一不渗透着这种儒家思想。

1. 君为臣纲

首先是“君为臣纲”。整个作品,几乎都是围绕这一纲领而展开的。君主是一国之主,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都得服从他,忠于他。忠臣、君子与奸臣、佞人都是以此为标准而被定性的。奸臣之所以奸,佞人之所以佞,就是因为他们对君王的态度。卢均向君主进谗言,惑弄之,欺骗之,终而背叛之,另觅外敌首领为其主子,就彻底地违背了“君为臣纲”这一条。董弘是他的爪牙,自不必说,其他属于“浊党”的一批奸人,也都出自相同的情况,只不过在程

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至于杨昌曲及其家人与部下,行为之所以正确,事业之所以辉煌,官职之所以晋升,幸福之所以取得,无一不是因其竭其才智与精力、效忠于君王而形成的。这一点在作品中有大量的描述和渲染,在杨昌曲所有的进忠言、抗敌兵、守疆土等政治与军事活动中,在江南红、碧城仙、一枝莲及杨之老父杨贤的战场厮杀、君前劝言、救护太后、起兵抗敌等行为中,都表现得十分生动、鲜明、强烈、酣畅,使人一目了然。

2. 父为子纲

“三纲”中的第二项“父为子纲”,是家庭两代人之间人伦关系的准则。《玉楼梦》的主要内容虽不是写家庭两代人的关系,但只要一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父为子纲”这个准则必定会得以充分体现。如杨昌曲在得到君王赏识而为翰林之后,很快就向君王“上疏请归觐亲”(第7回),回家乡见到久别的父母后,不胜歉疚,感慨地说:“小子不肖,半年离侧,尊颜尤衰,多貽朝夕倚闾之忧,不胜悚惶!”而杨昌曲由流放地归来,听说老父以年迈之身起兵抗敌上战场时,深感惭愧:“使老父不得闲食……胸中悲痛,即欲溘然无知”(第35回),念亲孝意极深。其他再如碧城仙与久别老父畅叙情怀、一枝莲与父亲祝融见面时所流露的感情,描写得也极其动人。

在对待个人婚姻的问题上,作品的几位主人公更是不敢自专,而是谨遵父命。例如杨昌曲内心虽极不愿娶黄阁老之女,甚至曾敢于为此顶撞皇命。可是当他父亲告诫他“此事不至大悖于义理,为臣子岂可再三拒逆?”以后,他立即俯首听命,接受了与黄家的婚姻。其后杨娶一枝莲,也是他父亲催促的结果。(第45回)

杨昌曲的两妻三妾,除江南红、碧城仙婚前无父母可禀告请示以外,都是依父母之言而定终身的。尹、黄出身名门贵族,自不必说,就是一枝莲,在远离父亲而又必须思考婚姻大事时,也以无法请示父母而暗自悲伤:“婚姻乃人伦大事,不告父母,自为主张,……不胜悲哀!”(第46回)

儒家十分看重孝道:“百善孝为先”,“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子女对父母之孝敬,也是从子女这个角度所执行的“父为子纲”。另外,在家庭中盛行夫权的情况下,对母亲的依从、孝敬,也是对父亲的敬重,是“父为子纲”的一种表现。

3. 夫为妻纲

“夫为妻纲”是儒家在婚姻制度方面所规定的一种人伦关系。《玉楼梦》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突出。

首先,“一夫多妻”就是这种观念最明白不过的体现。丈夫是中心,是一家之主,当然可以“多妻”,而绝对不能与此相反。

按常理,爱情是排它的,“多妻”对当事的女子来说,是痛苦的,但作品却以十分赞许甚至欣赏的态度描写了杨昌曲“一夫多妻”状态的形成过程,以及丈夫与妻妾为此共同感受到的“幸福、欢乐”,还描写了这些女子的“心甘情愿”、乐此不疲。没有这种以男子为绝对中心的“夫为妻纲”观念,是很难如此描写的。

在这种观念的统摄下,作品对于女子因丈夫另有所欢而必然产生的嫉妒心理,作了极强烈的谴责。黄夫人低下的人品、恶劣的行为,以及此后“恶有恶报”所遭到的惩罚和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这一系列浓墨重笔的描写,正是作者此种观念的鲜明表现。

《玉楼梦》中两妻三妾的大量活动都是围绕着她们共同的夫君而服务的。尹夫人的贤良和顾全大局,黄夫人的痛改前非,都是

为了效忠于丈夫，巩固以杨昌曲为核心的封建贵族大家庭。而江南红的战场厮杀，冒死救夫；碧城仙的琴声感动君王，使之承认错误，重新起用杨昌曲；一枝莲在局势危急下的护维皇室等等，虽带有“君为臣纲”的性质，却也是“夫为妻纲”原则的体现，是为了夫君杨昌曲，为杨增添光彩，光耀门楣。

既然是“夫为妻纲”，那么，妻子就应该永远居于夫君之下。五女中最富于聪明才智、最具有独立个性的江南红，就明确表示自己是永远低于丈夫的。

在第23回中，江南红见杨陷入敌兵重围，急忙单身冒死突入敌阵救援，杨被救脱险，却见江南红也因此而处于敌军重重围困之中，于是重新返身冲入敌阵，解救江南红。两人战罢归阵，江南红已因疲劳过度而昏厥，苏醒后认为杨再入敌军重围去救她，是不合适的。她说：“相公初围于蛮兵，为国事而然也……再入阵中，妾窃以为不可。女必从夫，妾之生死当从相公而同也。相公安危，何可以从妾？”并且还顾虑：如果他人见此情况，还会“嘲小妾之不以其道事君子”。

即使在一些生活小节上，也浸透着这种观念。某次，江南红在军中婉言劝杨昌曲节制酒量，杨怒。当时杨军职虽为“都督”，军衔也已是“元帅”的江南红见丈夫不乐意，却连坐都不敢坐，而是“侍立”在旁。

这位叱咤风云、驰骋战场的巾帼英雄，在丈夫面前却如此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尊夫抑己。这完全是由于“夫为妻纲”观念的长期压力而形成的一种性格表现。

“夫为妻纲”原本是为家庭内部的秩序而制定的，它和前面两条相为配合，形成为封建社会的一整套规范、体制。但没有预料到

的是,有关夫妻关系的这一条,到了《玉楼梦》这里,竟扩而大之,由家庭走向社会,由生活走向朝廷政治,由庭院屋宇走向刀兵战场,让女子在这样广阔、特殊的领域内也为丈夫尽力效劳。这里,“夫为妻纲”的原有范围和意义都大为扩展、延伸了。这也许是“三纲”原制定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吧?

当然,《玉楼梦》的爱情婚姻故事中,远不限于“夫为妻纲”这一条思想,作者还把一些带有时代性的新因素掺揉到他笔下的爱情故事中,这就是新兴市民阶层的趣味与观念。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另文中已有所叙述(见《〈玉楼梦〉——朝鲜古典文学中的〈战争与和平〉》)。因不涉及本题,不再赘述。

(二)“五常”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四者加上“信”,就成了“五常”,即指仁、义、礼、智、信。这五项也一一渗透到了《玉楼梦》的人物性格表现和事件发展过程之中。

1. 仁

“仁”是孔子学说的基本点,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樊迟问政,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主张“仁者爱人”。《玉楼梦》这一作品,旗帜鲜明地主张和宣扬这一观点。

杨昌曲次子庆星身为太守治理动乱迭起的江西时,对于动乱的参与者,不是以敌视态度进行暴力镇压,而是同情和体恤这些原本是“良民”的“盗贼”,认为他们是“平日良民,无故为盗,岂是本心?上而父母冻馁,下而妻子离散”,饥寒交迫,不得已而走上违法的道路。在给君王的上书中,他十分具体地描绘出民生疾苦:

“终岁勤苦，毛发焦黑，手足胼胝”，但所收获之粮谷，却被迫献给官府，还得遭受虐待：

“刑杖加其身，斥卖寒厨之釜鼎，老弱填于沟壑，少壮流离道路，号泣之声，憔悴之状，惨不忍睹。”（第59回）

庆星的这一上书，长近千字，就小说情节的发展看，大段地纳入如此长篇大论的议论文字并非必要。作者之所以如此，是痛感于当时朝政腐败和民生艰难，有意识以此表达儒家“以仁治国”的思想。

“仁”也是一种为人处世应有的态度。不仅在为政、治国这类重大问题上应当如此，在生活问题上，也应有“仁”的体现。

例如，碧城仙在受到黄夫人种种恶毒迫害几乎丧生之后，在黄遭受严厉惩罚、已觉前非、萌生悔过念头之时，她不仅不念旧恶、捐弃前愆，而且还怜悯、同情她，还为她说情。这是“仁”在为人态度上的动人体现。

子贡问孔子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字，孔子答道：“其恕乎？”（《论语·卫灵公》）曾子也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论语·里仁》）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碧城仙的做法完全符合儒家的教导。

2. 义

“五常”中的“义”，在《玉楼梦》中也有不少体现。杨昌曲和部将董超、马达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靠这个“义”字来维系的。当杨昌曲蒙冤被流配到远方时，他们两人义无反顾，不计艰难险阻，自发地秘密随行，暗中保护，以防奸臣派刺客加害于杨，从而在危急时救援了杨。

碧城仙被诬，被迫流浪山野，处境险恶，也是靠着他们两人的

机敏救援，幸免于难。

杨官复原职后，在江南红、碧城仙两人的推动下，把杨家的两贴身丫环晴、玉二人嫁给董、马二将，并破例为之举办贵族式的相当隆重的婚礼以作报答，也体现了这个“义”字。

黄夫人在奴婢春月唆使下派去暗杀碧城仙的刺客老娘，在发觉碧的善良无辜和含屈蒙冤后，义愤填膺，不但毅然放弃杀碧之举，而且转而严惩了暗杀的策划者春月。这更是大义凛然、义重如山的侠义行为了。

孙三娘救江南红于水中，虽是受尹夫人之托，但其奋不顾身，冒死救援，始终如一地和江南红一起共度坎坷难关、波澜曲折，其精神与品德也可以用这个“义”字来说明。

夫妻之间也要靠这样的“义”来维系密切关系。杨昌曲因进谏而蒙冤被贬谪于远方时，江南红为防止奸人的暗害，“以烈侠之风，忠义之心，不顾行色之苟且（寒碜），扮作家童，自从家夫之后……一匙水、一移步，如影随形，须臾不离”。途中住店，为了防止有人在鱼羹中下毒，江南红故意先尝，果然“浑身青气，口吐鲜血而昏绝”，杨遂得以免于遭害。这是夫妇之“情”，更是夫妇之“义”。（第27回）

共同为国家与杨府奋斗立功的江南红、碧城仙、一枝莲三人，相互体贴，友谊深长，终至于仿效《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结义，而于梅花院花林中，祷告上苍，庄严郑重结为三姐妹，也是这个“义”字在支配她们。

《玉楼梦》中，“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激发正义感和奋力从事正义行为，以及维系人物之间的良好关系上，这也正是“义”本身应有的作用。